

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定位 及其文化内涵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天津 300204)

摘 要:周瑜这个历史人物进入小说家的构思和创作中,被重新塑造后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是艺术创作的需要,“变异”后的周瑜形象相当成功:一是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典型人物,二是《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富有深刻人文意蕴的内涵。可以说,没有《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历史人物周瑜也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周瑜;《三国演义》;变异;民俗文化;嫉妒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6.07.001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6)07-0001-08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源于历史人物,但同历史人物相同的成分有之,相异的成分也有之。这是人所共知现象,原因是周瑜这个历史人物进入小说家的构思和创作中,被重新塑造后,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而且相当成功。其标志:一是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典型人物。二是《三国演义》的周瑜形象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在传统文化中富有深刻的内蕴。可以说,没有《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历史人物周瑜也不会在历代产生如此广泛的深远影响。

一、历史人物周瑜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为何发生了“变异”

历史人物周瑜进入《三国演义》以后,受到《三国演义》整体叙事框架、叙事单元、叙事线索的规定,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可以说《三国演义》人物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史传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大体与历史相去不远。而变异最大的莫不过周瑜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众说纷纭,究竟如何理解?

(一)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影响深远的英雄少帅

周瑜早在《三国志》中,已被历史学家陈寿盖棺定论“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受到历代的褒奖,鹰扬天

下。历史人物周瑜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范例。周瑜故里的学者李卫生概括“周瑜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36年,但却是辉煌的一生。他的英名盖世,智慧超群;雄才大略,胆识过人;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胸怀宽广,忠君荐贤;佳偶绝配,千古美谈,是历代人们所钦佩、羡慕和吟诵的一代英雄人物!”^[1]历代歌颂其的诗词之多,举不胜数,其中流播千古、最富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的豪放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周瑜形象的刻画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他兀立长江岸边,触景生情,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联想起曾指挥赤壁大战的周瑜的非凡气概,随即用“浪淘尽”三个字把大江与千古人物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时空背景,把时空焦距拉近了800多年,定格在周瑜身上。

收稿日期:2016-02-26

作者简介:郑铁生(1947—),男,河北枣强人,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可以想见周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象之深。

赤壁战场究竟在哪儿,向来众说纷纭。苏东坡用“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点出这是传说,诗人在此不过是借景怀古抒怀而已。以下“乱石”三句,集中写赤壁景物:陡峭的山崖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搏击着江岸,滚滚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是“一时多少豪杰”!但在如此众多的英雄人物中,诗人尤其向往那智破强敌的周瑜,所以下片“遥想公瑾当年”六句就集中腕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苏东坡选择了最能表现周瑜英雄业绩的闪光点进行刻画,几笔就把周瑜写得挺拔超群、靓丽生辉。

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²⁴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戮力攻取了皖城。得江南美女二人,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而后十年周瑜才指挥了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插入“小乔初嫁了”一句,既从生活细事上烘托周瑜的年轻得意,同时也是在向人们暗示: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方能使东吴保有江东。否则,杜牧《赤壁》诗所假设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后果难免出现。大战之前的紧张时刻,周瑜淡定自若,“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描写周瑜装束儒雅,风度翩翩,表现出了他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集中概括了周瑜指挥吴军用轻便的战舰,装满燥荻枯柴,诈称请降,驶向曹军,一时间火烈风猛,“灰飞烟灭”。试想,在滚滚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卓异不凡的青年将军周瑜,谈笑自若地指挥水军,抗御横江而来不可一世的强敌,使对方的万艘舳舻,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的气势!

英雄少帅事业、美女都集中于一身,令多少人钦慕,千古传诵。

(二)《三国演义》整体叙事框架:蜀汉是重心,其次是曹魏,再次是孙吴

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和渗透,是其对历史生活的艺术感知。他对历史生活进行反映时,所把握的不是现实时空的全部,而是其心理结构所选择和接纳的那一部分,即审美创造需要的那一部分。在情感意志和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对现实时空关系进行错位、变形和强化等艺术处理,这些都是小说家艺术创造过程中留存在其心理空间的审美意象。如何将它纳入叙事结构形式之中,使“象”与“形”有机统一并定型化,这就不得不借助现实时空予以表现。因此,小说家又得受社会历史生活的制约,这二者是在一个相互选择与同化

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说小说家一方面受制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认知,另一方面受驾驭于审美创造的需求。《三国演义》的叙事框架就这样形成的,最终落脚点是小说家对历史生活的艺术穿透力和表现力。

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再现总是与他的视野焦点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他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又是其构建叙事框架时的制高点。视野焦点是把叙事框架中再现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一个最佳的透视点,作为固定的叙事视角,去透视一切历史事件的因果和历史人物的关系。因而,才能把三国历史尽收眼底,哪一段历史时空为重心,魏、蜀、吴三国的人物哪些应在焦距的中心,波澜壮阔的战争又应该以哪些画面为最清晰和突出,于是一切都是以离焦距的高低远近程度而确定,来显示《三国演义》的时空关系和人物关系。从《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不难洞悉到罗贯中把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凝聚到“隆中决策”,作为一个视野焦点,去构建小说的整体叙事框架。《隆中对》概括历史生活的基本思想有三点:

1. 天下大势分析。在官渡之战后,诸豪强经过混战和吞并,只剩下曹操、孙权、刘表和刘璋几个主要的割据势力。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占据全国十三州中冀、幽、并、青、兖、徐、豫等州,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势力,“此不可与争锋”;第二种是孙权称霸江东,又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国势巩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第三种是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荆、益二州虽民殷国富,地理重要,但其主刘表、刘璋“暗弱”,守境自保,无所作为而“不能守”,正可取而代之,作为建立霸业的基地。

2. 刘蜀建立霸业的蓝图。即先“跨有荆、益”二州,有自己的基地之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稳固后方。同时要“结好孙权”,获得可靠的同盟者,从而形成鼎足之势,三分天下。

3. 刘蜀复兴汉室的政治目标。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师荆益,收复中原,完成复兴汉室的大业。

历史的合力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历史虽然没有完全按照《隆中对》的蓝图实现,但却成为罗贯中构建《三国演义》叙事框架的视野焦点。必然以此作为审美创造需要的准则,倾注着创造者的情感,灌注着创造者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识,体现着创造者赋予的“意义”。也就是以再现刘蜀建立霸业的过程为《三国演义》叙事的重心,这正是三国鼎足的确立和形成的历史时期。其视野即所感知的时空关系,瞬间的历史可以铺张在广阔的艺术空间,数年历史跨度也可以在一个瞬间的叙事中完成,完全打破客观历史时间的均匀性,而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现实时空。历史的现实时空虽然为叙事

时空提供了创造的基础,但审美创造的需要却发挥着叙事主体作用,直接地改变着历史的现实时空。第 1 回桃园结义至第 104 回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共计 51 年历史,竟用了 104 个章回。诸葛亮死后的 46 年历史,则只有 16 个章回。如果以诸葛亮在三国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生活的 27 年为限,即第 37—104 回,那么小说就描写了 68 个章回,占全书一半以上。以刘蜀集团的典型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绾结全书的叙事单元就有:三顾茅庐、刘备转战、赤壁大战、三气周瑜、刘备取川、争夺汉中、关羽之死、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几乎涵盖了《三国演义》的绝大部分内容。其实,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是最弱的一个。据《三国志》对三国史事的记载,《魏志》50 卷,《吴志》20 卷,《蜀志》只有 15 卷,不及《魏志》三分之一。而在《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的时空关系中,蜀汉则占据了中心地位,是被强化了的对象,其次是曹魏,再次是孙吴。可见,小说家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时空关系的强化上,主要是体现在三足鼎立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和与其同步形成的曹、刘、孙三个高能政治军事集团上,而且特别是以刘蜀集团为重心的。从这个视角审视,无疑周瑜这个历史人物必然受到整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的制约,从宏观上就表现出来叙事的时空差。赤壁之战前,重心是描写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形成三足鼎立的前提,因此,鼎足之一的孙吴扩展、巩固、占据江东是略写,当然周瑜也是略写。赤壁之战是三国鼎足过程的艺术特写,周瑜作为指挥赤壁之战的统帅,虽然是重点刻画对象,但为了烘托诸葛亮,对周瑜也作了相应的“变异”,使得周瑜形象和历史原貌不尽相同。

(三)《三国演义》叙事框架下赤壁之战前的周瑜形象

罗贯中用简略的笔墨记述孙吴已历三世,周瑜追随孙策,视同兄弟,为开创江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辅佐孙权,成为肱股之臣,扼守军事。周瑜受到东吴君主如此赤诚相待,并为他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广阔天地。可以说,《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前的周瑜的形象与历史人物切近。

1. 周瑜追随孙策

《三国演义》描写公元 195 年孙策召周瑜共创江东大业,破横江、进曲阿、守丹阳、占皖城,当时才 24 岁,人皆呼周郎。这段历史记述周瑜与孙吴事业的起因和过程,比较简略,也与史册记载基本相吻合。第十五回描写:“行至历阳,正行之次,见一彪军到。当先一人,见策下马。策视之,其人面如美玉,唇如点朱,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汉太尉周景之孙,洛阳令周异之子。初,孙坚讨董卓之时,移家舒城,

瑜与孙策同年,结为昆仲。瑜小策两月,以兄事之。策住瑜道南大宅,策与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如此至交甚厚。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因往省亲,到此与策相见,以诉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策曰:‘吾得公瑾,大事谐矣!’”

这段历史取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瑜长壮有姿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

2. 周瑜辅佐孙权

在《三国演义》中有详尽的叙事。孙策刚刚死去,孙权继兄业掌大权,便想大有作为。虽因得天独厚地占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但如何策守父兄之业,孙权向周瑜请教。周瑜说:“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周瑜向孙权推荐了鲁肃,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亮,张紘又推荐了顾雍。以后“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文得阚泽、严峻、薛琮、程秉、朱桓、张温、骆统、吾粲等;武得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早在其父孙坚时,就有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四将英名令人瞩目;到了孙策时,有周瑜、张昭的辅佐,又添了一批虎将如蒋钦、周泰、陈武、太史慈、凌统等。孙权招揽贤才,知人善任,深得民心。一时人才荟萃,文武咸集,“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

第二十九回:“时孙权既掌江东大事,尚恍惚未安。人报中护军周瑜自己提兵回吴。权曰:‘公瑾已回,吾无忧矣。’却说周瑜守御巴丘。听知孙策中箭,因此回来。将至吴郡,听得策亡,星夜来奔丧。哭拜于灵柩之前。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言尽告周瑜,瑜曰:‘瑜岂敢当托付之重任哉!’吴太夫人曰:‘江东之事,全仗公瑾,愿不忘伯符之言,则孙氏举族荷蒙矣!’周瑜拜伏于地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乎!’权入,拜谢曰:‘权愿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训诲。’瑜顿首曰:‘某以肝脑涂地,以报相知之恩。’权曰:‘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权曰:‘先兄有言:内事委托子布,外事皆赖公瑾为之。’瑜曰:‘子布贤达之士,将军当以师礼待之。瑜弩钝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辅将军。’权问是谁,瑜曰:‘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生而丧父,奉母至孝。其家极富,大散资财,以济贫乏。瑜为居巢长之时,将数百人经过,因无粮食,往求稍助。其家有两囤谷米,各三千斛,见瑜

言,即指一困与之。平生好击剑、骑射,寓居曲阿。祖母亡,还葬东城。其友刘子扬数次请往巢湖就郑宝处,此人未去。将军可速召之。’乃淮东城人也。姓鲁,名肃,字子敬。权遂教周瑜请之。

瑜奉命亲往,肃接着共坐。肃问其故,瑜将孙权相待之意白之。肃曰:‘刘子扬曾召吾往巢湖,某欲就之。’瑜曰:‘昔马援对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吾主人孙将军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天运代刘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成帝基,以协天时,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

这段历史散见在诸多史书上,如《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周瑜自巴丘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众事。时策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而服事焉。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初,瑜见友于孙策,太夫人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3. 拒曹送质子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描写,建安七年,曹操趁灭掉袁绍之声威,下令孙权送质子到许昌。孙权既慑于曹操的兵势,又怕受到曹操的挟制,犹豫不决,于是请张昭、周瑜面议。张昭拿不定主意,而周瑜以过人的胆识,斩钉截铁地回答:“将军承父兄遗业,兼六郡之众,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质于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连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则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别以良策御之。”周瑜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了送质子的利弊,从而保持了东吴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地位。

《三国志·周瑜》注引《江表传》曰: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义,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人,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

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以上选择以赤壁之战前的典型史实,对照了《三国演义》和史书的记载,可以说周瑜的形象与历史人物切近。

二、历史人物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发生“变异”始自赤壁大战

“赤壁大战”(43—50回)用最详尽的笔墨刻画了周瑜的战略意识、统帅才能、军事指挥,也暴露了狭隘的心理因素。历史人物周瑜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发生“变异”始自赤壁大战。

(一)历史人物周瑜的形象在《三国演义》的“变形”,是从描写周瑜心胸狭窄、意气用事开始表现出来的

《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叙事结构线索,虚构出了重要的情节: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劝说孙权。这些在历史框架基础上的情节的一个重大重构,就是把诸葛亮放到了历史大变革的舞台的中心位置,塑造了一位封建地主阶级超群的政治家。诸葛亮以高屋建瓴的气魄,洞悉一切的远见卓识,谙熟斗争艺术的才能,机敏多变的智力,去扭转危局,实现孙刘联合,与曹操决一雌雄。围绕着战还是降这场争论的展开,诸葛亮不仅善于捕捉主要矛盾,打开缺口,而且善于具体人具体对待,促其向有利的一方转化。孙权能否下定决心,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周瑜的态度。因而,诸葛亮抓住周瑜性格素质的弱点,不善自制,容易冲动,意气用事,演化出一场“诸葛亮智激周瑜”的喜剧。毛宗岗在第57回批道:“周瑜年少,经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诸葛亮只是利用了周瑜这一弱点,并没有加害他。倘若有人蓄意谋害,不难想象,轻则被贬,重则连脑袋也保不住。

从“赤壁大战”至“争夺汉中”是《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的高峰,描写了三足鼎立的历史形成过程。赤壁大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这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从孙吴一方来说鼎力维护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这一决策的代表性人物只有两人,一是鲁肃,一是周瑜。而且作为军事统帅的周瑜对孙权的决策影响更大。对此《三国演义》描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如周瑜主战,劝说孙权,团结老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等。从而塑造了一位青年统帅的形象,刚毅果断,明智审慎,气度博大;运筹帷幄,雄才大略,但在对待同盟军的军师诸葛亮的才高于己时,又表现出心胸狭小,嫉能害才。如周瑜与诸葛亮智斗,虚构出一场“草船借

箭”。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蒋干中计后,周瑜心中十分得意,便派鲁肃去诸葛亮处,“试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诸葛亮没等鲁肃发话试探,先以贺喜为由说破此事,弄得鲁肃“开口不得,把些言语支吾了半晌”。鲁肃回去以后,实说了此事,周瑜大惊,决意杀掉诸葛亮。鲁肃劝说:“‘若杀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肃曰:‘何以公道斩之?瑜曰:‘子敬休问,来日便见。’”这里描写的鲁肃,确实有点“愚”,他不但把握不了周瑜的巧妙算机,也测不透诸葛亮的高深城府。等到鲁肃私自调拨船只、士兵与诸葛亮后,“至第三日四更时分,孔明密请鲁肃到船中。肃问曰:‘公召我何意?孔明曰:‘特请子敬同往取箭。’肃曰:‘何处去取?孔明曰:‘子敬休问,前去便见。’”周瑜一个“休问”,诸葛亮一个“休问”,却都瞒着鲁肃,等到这些机谋被说破,“肃方才省悟”。鲁肃忠心事吴,但卓识远见,弘毅宽厚,忍辱负重,不忍周瑜加害诸葛亮,常常在关键时刻暗中保护诸葛亮,使得周瑜杀害诸葛亮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鲁肃有宽宏的风度和气量,往往起到人际关系调节的作用,避免了周瑜急功近利,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孙吴政权的巩固,真可谓“大智若愚”。孙刘联盟的成功,赤壁大战,曹操惨败,孙刘的势力增强,出现了天下三分的雏形和趋势。

(二)周瑜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始终与维护孙吴的基业连在一起,成为其性格之中的个性特征

曹操统一北方,虎视江南,而孙权、刘备的人才实力虽然都无法单独和曹操相匹敌,但他们各自也已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势力。孙、刘在赤壁之战虽然联合起来了,但之间的矛盾时而急剧,时而缓和,构成了荆州之争,可以说是三国时代最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三国鼎立的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谋取荆州,“思有桓、文之功”是孙吴集团的既定方针。孙权继位,便“思为桓、文之事”,鲁肃对策: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

鲁肃向孙权提出了《吴中对策》,分为近期和远期目标。近期所谓“剿除黄祖,进伐刘表,”便是谋取荆州。后来甘宁为孙权献策,将近期目标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所必争也。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传基,明公宜早图之;若迟,则操先图之矣。今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战具不修,军无法律。明公若往

攻之,其势必破。既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

孙权高兴地称道:“此金石之论也!”

三国时期的荆州,北部抵南阳郡,南部跨广东,中部包括湖北、湖南省的大部。辖长江,贯湘水,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兵源和粮源的重要地区。地理位置决定其为三国争雄的战略要地,对于刘备来说,“隆中决策”战略目标:“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益州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对孙权来说,先据荆州,后图巴蜀,才能划江而治,然后霸业可成。对曹操来说,进占荆州,方可一统天下。荆州在三方力量的作用下,相动相克,所有的“人谋”都在相动相克上用尽心机。荆州之争《三国演义》是一个中心历史事件,整整五十个章回,都运行在“荆州之争”这条结构线索上,三国最杰出的人才都主动地或被动地卷入“荆州之争”的历史旋涡中,他们或制造、或引发、或推动而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是“荆州之争”相动相克的具体体现。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共同分战荆州,曹操占据襄阳以北的南郡、江夏郡的一部分和南阳郡;孙权占领南郡和江夏郡的另一部分;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荆州三分是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的缩影,从第三十五回至第五十三回的情节都是这一时期形象的写照。但共同分占荆州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各方都处心积虑地想独霸,因而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从赤壁大战之初,诸葛亮看清了周瑜心胸狭窄这一弱点,采取“智激周瑜”的方法,就是罗贯中塑造周瑜性格变形的开始,随着情节的渐进,曹操败北后,孙、刘争夺荆州的拉锯战开始了。孙权对于荆州是朝思暮想,势在必夺;刘备以柔克刚,赖着不还。孙刘之间,明争暗斗,时紧时松。周瑜为夺取荆州,处心积虑地施展计谋,急功近利,气急败坏,而使他的性格弱点越来越突出。周瑜的智谋,总能让诸葛亮看透;他的计谋,又总能被诸葛亮化解。周瑜与诸葛亮两个杰出的人才,在对比中不仅展示各自的风采,而且衬托诸葛亮是一位更加智慧的典型。如果说在“赤壁大战”那个结构单元中,这种对比还是点缀或侧面烘托的话,那么在“三气周瑜”这一结构单元中,则完全是正面对比。

(三)“三气周瑜”是小说的典型化,也是历史人物周瑜“变异”的定型

《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写“一气周瑜”。

当曹操赤壁败北的尘埃未落,刘备就顾不得孙刘联盟的大局,与东吴抢夺南郡。周瑜和鲁肃一道来告之刘备,东吴取南郡“已在掌中”。刘备笑曰:“胜负不可预定。曹操临归,令曹仁守南郡等处,必有奇计;更兼曹仁勇不可当;但恐都督不能取耳。”俨然以一副霸主的姿态告诫周瑜,微笑中含有不以为然的神色。周

瑜心骄气盛,被刘备略微一激,马上就回答:“吾若取不得,那时任从公取。”刘备抓住周瑜一时语失,立即认真敲定说:“子敬、孔明在此为证,都督休悔。”诸葛亮又附和着应付了周瑜。待周瑜、鲁肃走后,刘备问诸葛亮:“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虽一时说了,展转寻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穷一身,无立足之地,欲得南郡,权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属东吴矣,却如何得住?”一语泄露天机。刘备一心想得南郡,而表面上却做出宽容大度的样子。“一气周瑜”,周瑜万万没有料到他好不容易打败曹仁,满以为南郡到手了。想不到诸葛亮派赵云捷足先登,夺得城池。

“二气周瑜”是在周瑜出谋,让孙权的妹子嫁给刘备,借机扣住人质,交换荆州,结果弄假成真。俗话说得好:“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嫁妹弄巧成拙后,又一反常态,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妄想挑起曹操与刘备的矛盾,渔人得利。孙权的这套把戏,被曹操识破,并把这个“球”又踢了回来,借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引起孙权和刘备的厮杀。周瑜战略眼光浅近,只顾孙吴利益,发兵“假途伐虢”,欲取荆州。在周瑜一心想索取荆州,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诸葛亮施计,使周瑜的举措每每落空。不料,“三气周瑜”的结果,周瑜竟被气死。小说描写周瑜病重在巴丘,做临终遗嘱,“言讫,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有诗曰:“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既生瑜,还生亮。”都是小说家虚构的,虽然给人气量狭小的印象,但毕竟还没有“把这位出则随‘大帝誓师江水绿,’入则有‘小乔卸甲脱妆红’的人物丑化。……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直、谅,划策有艳招,风头足,名声好,立动太骤,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心。就是当时的友方刘备,敌人如曹操,也说过中伤周瑜的话”^[2]。

“三气周瑜”,即《三国演义》第五十一—五十七回,这一叙事单元完全是陪衬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而且同历史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异也主要在这个时空阶段。刘备趁着曹操赤壁败北,便抢占了荆州,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业,与孙权集团产生一系列冲突。小说情节集中为“抢荆州”、“借荆州”、“讨荆州”,以及孙刘交恶以后发生的“失荆州”几个过程,围绕荆州的争夺而牵涉着曹、刘、孙三方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典型人物周瑜和诸葛亮在荆州之争上,表现出他们之间智慧、胸怀和目光的高低深浅,但周瑜个人气质不是孤立的出现,而一直裹挟在孙刘争夺这条叙事线索上。对于刘蜀来说,在荆州问题上扯皮,是刘蜀集团的利益和智慧结晶,外交的成功。对于孙吴来说,周瑜在荆州问题上维护了孙权集团的利益的狭隘做法,客观上有损孙刘联

盟的大局。

周瑜之死引起东吴将领对诸葛亮的仇视。为了维护孙刘联盟的大局,诸葛亮冒杀身之险,亲自到东吴吊孝。悼词中颂扬了周瑜的人品、才干、风度和功业,悲痛“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第57回)孔明吊孝,避免了因周瑜之死而导致孙刘联盟破裂的危险。这“三气”一次比一次递进,一次又一次失败,总是着鞭在后,弄巧成拙,形成对比。用他切身的体会则是:“既生瑜,何生亮!”把两位杰出的人才放在沧海横流的时代,用对比的方式,显示出周瑜的弱点:器量狭小,容易冲动,感情用事,衬托出诸葛亮的大气大度,稳健谨慎,不动声色。既联合又斗争的艺术,就是力求以外交的手段来谋取有利的转机,避免孙权和刘备两大集团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自公元210年周瑜死后,孙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稳定,这是三足鼎立能够向前发展的关键。

无论周瑜,还是诸葛亮哪一个天才,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从小说描写来分析,周瑜之死在客观上对孙刘联盟还带来好处。假如周瑜不死,孙、刘两家过早地火并,必然造成曹操的卷土重来,那么“铜雀春深锁二乔”也未可知。周瑜死后,在鲁肃与诸葛亮的共同努力下,孙、刘联盟出现了稳定的局面,这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向前发展的平稳时期。至于周瑜为东吴着想,想方设法为东吴讨回荆州,实现一统江南的大业。诸葛亮为刘蜀尽力,千方百计保住荆州,借此为基本,发展西川,实践“隆中路线”。这些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每一个政治势力各自的战略意图,各自的意志。但历史的进程却不是以某个领袖或阶级代表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不同政治势力的意志之间的相互制约,都对历史的进程有所牵制,有所贡献,从而形成一个历史合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三气周瑜”整个单元着重表现智者之间的较量,这是盟友之间在一定程度内的矛盾,与誓不两立的敌对双方血腥厮杀大不相同,所以作者在多数场合都以轻松的笔调展开描写。如写鲁肃几度与诸葛亮交涉,颇有令人捧卷欲笑之妙……“二气”时诸葛亮命军士高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三气”时刘备军大叫“活捉周瑜”,也都带有调侃的意味。这种格调,不仅与这一单元的内容合拍,而且夹在赤壁之战与渭南之战之间,也使全书的风格富有变化。”^[3-4]

三、《三国演义》周瑜形象塑造的成功折射出传统文化的巨大内蕴

历史上的周瑜在《三国演义》“变异”中,塑造成为

文学典型。

文学经典理论告诉我们,能够成为典型,必须准确寻找所谓对人物个性、对事件本质起界定作用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切点。只有把握这个切点,才能为艺术真实的核心问题“艺术虚构”定位。虚构的性质和功能是多层面的,而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艺术虚构”永远不能离开“艺术真实”的磁场,由此规定了它的性质。它一头牵着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一头又蕴含着社会的普遍性。是人物性格、典型的社会环境和真实的细节相融合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周瑜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这一个性特征,始终与维护孙吴的大业连在一起,与孙吴夺取战略要地荆州裹挟在一起。这是《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虚构的“历史真实”的基点。围绕这个基点所折射历史意蕴,凝缩了千百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正是如此,《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才流芳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的总体流向决定了封建知识分子精神上热衷政治,以见遇于君、见荣于世,为终身追求之鹄的。他们往往本着“士为知己者而死”的信念,效命于英主,正如晋朝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所说:“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因此,人主和智囊人物的关系,就决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君主对权臣的依重,往往取决于权臣是否能代表君主的意志,是否是君主意志的执行者。周瑜和张昭都是顾命大臣,为什么张昭逐渐在孙权的心目中失重,而周瑜愈加得到孙权的依重,其根本原因是周瑜体现了孙权的君主意志,对孙吴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为孙策复仇,征伐黄祖,孙权“命周瑜为大都督,总水陆军兵”。这次战役大获全胜,击杀黄祖,夺得江夏,为图谋荆州打开了道路,从此使孙权独霸江东,威振天下。战赤壁,三分天下是周瑜最光辉的业绩,也是他指挥的著名的一次大战,从此使气焰嚣张的曹操再也不敢窥视长江以南。这年周瑜才33岁,却已充分显示了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军事上的雄才大略。

如果进一步分析《三国演义》中周瑜性格素质的弱点,心胸狭窄,不善自制,容易冲动,意气用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弱点在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易被他人所利用、所谋算。诸葛亮就看清了周瑜这一弱点,遂利用了,于是智激周瑜、三气周瑜。所以毛宗岗在第57回批道:“周瑜年少,经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倘若有人蓄意谋害,不难想象,轻则被贬,重则连脑袋也保不住。这也说明青年时代的孙权知人善任有过人之处,在三国英主之中实无出其右者。

孙权与周瑜相识到周瑜英年而逝,相交整整十年(200—210)。孙权是19岁至29岁,周瑜25岁至35

岁。此时正是孙权继承父兄基业,锐意进取,开疆拓土;政治开明,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重视人才,敢于破格擢用人才之时。也就是说东吴君主与周瑜建立起肝胆相照、生死不移的关系都处于青年时代,无论当时历史客观条件,还是年轻人的性格特点都有利于这种关系的维护。正是由于周瑜受到东吴君主如此赤诚相待,并为他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广阔天地,所以他才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建树丰功伟绩,辅佐孙权,独立江东。正如周瑜在群英会上起舞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渴慕明君、建功立业,以见遇于君、见荣于世为终身追求之鹄的。与这首歌相映成辉的是周瑜对蒋干表明心迹的一段对话:“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酈生复生,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闻其声,听其言,一位年轻有为、志满意得的统帅,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心忠志坚、意气风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周瑜和司马懿都是第一流的智囊人物,而且两人年龄相仿。周瑜死时年仅36岁,而司马懿得到曹魏君主的重用,已进入不惑之年了。早在建安元年(196)司马懿18岁时,便随其父兄投靠了曹操。他的官职,虽然也不断迁升,但并未受到重用,可他的谋略和才干却已显露出超人之处。刘备进位汉中王后,曹操十分震怒,发誓要消灭刘备,于是当即传令,尽起倾国之兵,赴两川与刘备决一雌雄。这时“一人出班谏曰:‘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须张弓只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须一将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视其人,乃司马懿也。操喜问曰:‘仲达有何高见?’懿曰:‘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据荆州不还;彼此俱有切齿之恨。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第73回)司马懿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计谋,实质是联吴击蜀,以此与诸葛亮的联吴抗曹的方针相抗衡。利用矛盾,拉住一方,打击一方,保存自己。不然,曹操以倾国之兵,深入蜀地,后方空虚,若孙刘联合,乘虚而入,曹操也会首尾难顾,处于两面受敌。所以,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后来关羽之死,蜀汉失荆州。这与司马懿联吴击蜀方针不无关系。此后,司马懿几次进谏奇谋,都被曹操采纳,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曹操活着的时候,司马懿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为什么他俩同时生活在一个沧海横流的竞争时代,周瑜年轻得志,30多岁已是举世瞩目的杰出的统帅,而司马懿却在后半生才进入大建功业的黄金时代

呢?周瑜和司马懿除了各自性格素质不同而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主为他们提供的发挥才智的机遇不同,施展抱负的环境也不同。东吴君主对周瑜相知之深,倚重之切,在三国智囊人物中是不多见的。周瑜一投身天下豪强的竞争中,就受到真正开创东吴基业的君主孙策的倚重。二人倾心,结为昆仲,孙策喜不自禁地说:“吾得公瑾,大事谐矣!”可惜孙策年仅 26 岁,壮志未酬竟夭折。他临终嘱托孙权:“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从“临终遗大事,专意嘱周郎”一事看,周瑜不但在孙策的心目中,就是在东吴政治集团中的地位,也是屈指可数的。孙权一登上吴主的宝座,便召见周瑜,求教大事。

苏东坡为什么如此艳羡周瑜?还特别点出江南美女“小乔”嫁给了周瑜。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人性欲望往往被建功立业所掩盖,其实在心灵深处莫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底蕴。他们除了热衷政治,以见遇于君、见荣于世为终身追求之鹄,而外还流露出人性的欲求,往往以有娇妻美妾为最大的满足。中国的士大夫一向认为:一、年轻有为;二、建功立业;三、娇妻美妾。这是人生最得意的事情。历史上多少人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代价,只得其一二,很难三全其美。周瑜不仅做到了,而且是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到了,如此完美,令多少人可望不可即。

苏词结尾调子转入低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东坡回到眼前的政治现实,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回想当年他振兴

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感到大相抵牾。一旦从“故国神游”跌入现实,就不免自笑多情善感,慨叹光阴虚度,而无奈地归结为以酒浇愁了。苏东坡的感叹,更反衬周瑜是千古难寻的一个典型。从一般社会现实而论,韩愈所说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骐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民谣所揭示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因此,理想与现实尖锐的冲突在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人的心理上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周瑜文学形象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流播广泛的三国故事、三国戏剧、三国说唱,更重要的是周瑜现象凝缩了千百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即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人性的欲求总是被社会现实所挤压,良臣贤将永远是君权下的统御的工具。这一直是封建社会和政治的重要内容,乃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人们从政治学、社会学、人才学等各个角度,都可以从周瑜身上读出有意味的东西,正因如此,《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才流芳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吴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陈迹冬. 闲话三分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4.
- [3] 周瑜文化论文集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 李卫生. 话说周瑜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The Place of ZHOU Yu's Image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ZHENG Tie-s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figure, ZHOU Yu, has entered the designing and creation of novelists, and his image has mutated after it was reshaped. Such mutation is the need for the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ZHOU Yu's image is quite successful after the mutation. Firstly, ZHOU Yu has become the famous typical figure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Secondly, his image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has made great influence in the folk culture. Thirdly, such image has shown the profou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without the ZHOU Yu's image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the historical figure ZHOU Yu would not have exerted such extensively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 ZHOU Yu;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mutation; folk culture; jealousy

(责任编辑:王建平)